

# 项英的辉煌与失落

皖南事变之后，在中共党史上，项英成了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时值他百年诞辰，作者觅其革命生涯的一些焦点时刻，向世人较客观地评说他的是非功过。

● 曹 英

项英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项德隆。1898年5月，生于武昌，父亲是县里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

项英小学毕业后因父亲去世，家境恶化而辍学，12岁就开始了学徒生活。项英由于有小学文化程度，待人又热诚，在纺织厂两千多名工人中很快便成了活动积极分子。

当时，中共主要精力集中于产业工人最为密集的铁路、矿山、海员、纺织诸行业中做工运发动，并从中发现优秀分子作为党的中坚力量。

武汉铁路工人集中于京汉铁路段的江岸区，由于1921年8月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取得出人意料胜利，京汉路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期望效法，一大代表武汉区委书记包惠僧抓住这个时机，决定首先组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作为劳动组合书记部（即工会）武汉分部的核心分支机构。

正巧，从《劳动周刊》上得知包惠僧这一想法的项英给包写信，说自己非常希望能参加工会工作，

包惠僧喜出望外，两人约见后，包惠僧从项英身上发现了工人革命活动家需要的素质：有思想，有抱负，热情，大胆，纯洁，于是包惠僧就把项英作为武汉党组织工运活动的理想人选加以培养，12月，包惠僧委任项英为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筹备处文书，负责俱乐部的筹建工作。这一年，项英24岁。

江岸工人俱乐部在武汉是最大的工人组织，项英参与筹组时，京汉铁路工人在武汉分为多个帮口，尤以湖北帮、福建帮、江南帮势力最大，例如当时的武汉工运领袖杨德甫、周天元、林祥谦、黄桂荣均是各帮口的“龙头老大”。项英经过协调与游说，将他们全部吸收入俱乐部筹备处，还化解了各帮口头之间的矛盾。

包惠僧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说：

项德隆与各帮的领袖人物处得很好，因为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纺织工人，丢掉了自己的职业来搞江岸工人俱乐部，他们认为这样舍己为人的精神是很难得的。而且他能说会写，年纪又轻，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各方面的人及关系搞得很好。

项德隆在名义上担任工人俱乐部的文书，实际上是担任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教育工作，他同工人生活在一起，学习在一起，与工人水乳交融地团结在一起，树立了他在工作中的威信。

1922年4月，包惠僧介绍项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仅三个月的项英，就成了中共“二大”12名代表之一，但项英真正成为闻名全国的工运领袖，是他协助张国焘领导那场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

“二七大罢工”的缘起是京汉铁路16个工会组织要求联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那是1923年的2月1日，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会的代表如期赶到郑州市中心的普乐园戏院，直系军阀吴佩孚派出的军警包围了会场，时为总工会筹委会总干事的项英，在交涉无效后，率先冲进会场，表现出极强的大无畏精神，在现场的包惠僧事隔三年后撰文回忆说：

江岸工会总干事项德隆同志，领率数千工人，冲过了吴佩孚大军的警戒线，从枪林刀山之中走过

去，启了会场的封条，工友群众及各处工人代表鱼贯而入者达五六千人……

总工会在敌人刺刀下成立，选举武汉工联主席杨德甫为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

随后，总工会举行全路工人大罢工，号召工人“为自由作战，为人权作战。”顿时 1200 公里的铁路线陷入瘫痪。斗争重心转移到武汉后，项英作为首席工人代表，率三名工人与湖北当局进行谈判，立场十分坚定，2月7日下午的大屠杀中，项英迅速脱离现场，躲开了敌人的捕杀。

在中共三大上，项英与王荷波、朱少连作为工人代表进入中共中央九人执委会，项英从此开始步入中共领导层。

这一时期，项英在上海、武汉组织工运，到 1925 年中共“四大”召开，项英再次当选为中央执委。

1927 年元旦，广东国民政府临时首都迁至武汉，市民举行庆祝大会，3 日，英租界当局对讲演学生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三十多人，造成震惊全国的“一·三惨案”。

这时，湖北省总工会由向忠发任委员长，副委员长是李立三，刘少奇任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就是项英。

5 日在总工会四大领袖的策动下，组织 30 万人为“一·三”惨案死难者举行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包围租界巡捕房，要求武汉政府收回英租界，经过多次交涉，3 月 15 日，汉口英租界终被收回，紧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领导武汉工运的四大领袖名满全国。

### 三

中共六大是在大革命严重失败的血雨腥风时刻，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基列布若野别墅召开的，118 名代表（正式代表 84 人，候补代表 34 人）来往路费全由苏



1939 年，项英、叶挺与周恩来在云岭

共支付，会议的议程由共产国际书记、苏共中央第二号人物布哈林亲自制定。会议按照斯大林的意图，对中共中央，尤其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进行了大改组，一批被认为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和与陈独秀右倾路线有牵连的知识分子干部与领袖被清洗，大量补充了工人出身的“新型血液”。

最后，会议选出 14 人组成的政治局，正式与候补委员各 7 人，在正式委员中，向忠发、苏兆征、项英三位工人代表均以高额票数当选，三人均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忠发更是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另两位常委是周恩来与蔡和森。

项英自莫斯科归国后，分工主管职工运动和妇委的工作，并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工运的第一号领袖（苏兆征已病逝）。不久，蔡和森在顺直省委犯“左倾”错误，被向忠发免去常委职务，由李立三继任。

由此，“李立三路线”开始了它的“鼎盛”时期，项英被任命为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书记，负责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 5 省总暴动，并肩负李立三、向忠发寄

予厚望的“力争武汉武装暴动首先胜利”的重任，并策划、组织了数次城市暴动，结果无功告终。

在 1930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项英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其工作有变动，决定由他进入中央苏区，即毛泽东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组建苏区中央局。

项英于 1930 年 11 月只身一人前往苏区，据项英在 1938 年 6 月写的《自传》说：

三中全会后，“中央派我到江西苏区去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苏维埃中央，首先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我为主席，并代理党的中央局书记。于是，于 1930 年 11 月入苏区，到 12 月底经福建苏区到江西，与朱、毛会合。这时，正是红军取得冲破第一次‘围剿’，获得大胜利，将十八师师长张辉瓒活捉。从此，我放弃了多年来的工会工作和白区秘密斗争，开始学习军事和苏维埃政府工作。

项英在苏区的四年间，主要职务就是代周恩来担任中央苏区局书记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职务，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到职不久，就在对待



六届六中全会与会者：左起，第一排：贾拓夫、高岗、谭政、朱德、张文彬、曾山、黎玉、刘少奇、博古、萧克、项英、谢觉哉；第二排：程子华、关向应、彭德怀、徐特立、成仿吾、潘汉年、徐海东、杨尚昆、萧劲光、罗瑞卿、李维汉、朱理治；第三排：李富春、郭述申、孟庆树、高文华、邓小平、彭真、王明、王稼祥、周恩来、冯文彬、滕代远、李昌；第四排：曹轶欧、柯庆施、康生、罗荣桓、吴玉章、林伯渠、贺龙、张闻天、陈云、刘子久、林彪、张浩、毛泽东

“富田事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分歧。

“富田事变”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要大肆清洗所谓“AB团”分子，首先受到打击的是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及其领导的地方、军队负责人。

当时四万人不足的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主持下抓捕4400多个AB团分子。初来乍到的项英，认为是“乱打乱杀”、“小资产阶级报复主义”引起的不幸“肃反”事件。

但是王明中央却仍然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毛泽东亦坚持认为用敌我矛盾处理是正确的。并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组成中央代表团，于1931年4月到达中央苏区，参加中央局领导工作。项英坚持做内部矛盾处理，并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但孤掌难鸣。接着，这一莫须有的罪名迅速扩大，有的地区的地方干部90%以上被处决，连同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前后杀戮了

近10万人。在红军中造成了一片红色恐怖。

主力红军长征后，项英是被作为中革军委代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义来担任全面领导工作的，他被任命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期间，或许是由于环境严酷等原因，项英也“左”了起来，处决了上千名“反革命”。连宁都起义的重要领导人季振同、黄仲岳都遭到秘密处决。

到1937年10月，历尽苦难的项英、陈毅等与中央取得联系，11月7日，项英到达延安，回到中央身边。

#### 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将南方游击队改编，组建成新四军，以北伐名将，时在海外流浪十年的叶挺为军长，项英作为副军长兼政委实际主持全面工作。1938年4月，分散8省14个游击区的

红军和游击队共10300人、6200余支枪集中在皖南地区。

1938年9月，项英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是解决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毛泽东政治领导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项英被选为15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新四军主要活动区域分江北、江南两部分。江北主要是八路军主力黄克诚部、陈毅所部，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则活动于苏南与皖南。

项英和叶挺相处，两人关系极不融洽，主要责任在于项英以党的领导者自居，独断专行，叶挺几次出走，经周恩来说服两人的感情才趋于缓和。

194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收到项英转来的陈毅、粟裕来电，述说了三年多来新四军发展的主要问题，说：坚持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这也是新四军领导人一直努力争取的主张。但目前新四军“弱点是兵力不足、不够，皖南、苏南分开则力弱，合则

可以开展局面。苏南地区是解决人、枪、款的良好地区，皖南因处于国共、日本、伪军的战略枢纽地区……因此，陈毅、粟裕建议：目前因新四军力量有限，应先放充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

项英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熟悉南方山区地形和社情，认为新四军坚持皖南是有条件的，目前国共还不至于严重到立刻兵戎相见，威胁到新四军的生死存亡。中共中央一度相当坚决地主张新四军主力转移江北或苏南，使八路军、新四军连成一片，扩大华北根据地，暂时放弃江南几块根据地，以保存新四军主力，所以在复电项英时，中央提出：“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

1940年8月16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周恩来在会上作重点发言，说：目前国内总的趋势，东方存在中日妥协的可能……我们党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投降，争取好转。现在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坏转，是拖的局面。周主张同国民党谈判时在小问题上让点步，以便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和缓反苏反共的危险。对此，毛泽东表示赞同。

12月1日，中央书记处则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提出12项谈判条件，其中第一项就是“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第三条则是“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唯有渡河南下”，态度十分坚决。

12月22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蒋介石对中共的态度，说：蒋现在对外取外柔内刚的做法，我们应针锋相对，也宜外柔内刚，“可不能在政治压迫和军事进

攻的情况下北移”。但为争取中间分子，分化顽方，可将工作布置时间延长两月，仍采取“佳电”办法，说皖南新四军已动，江南军队的北移有种种困难，拟请求延缓移动日期。关于行动方向，周恩来建议皖南新四军速移苏南，加紧向顾祝同要枪要粮，以便渡江；顽方将政治和军事分开，我们要把政治进攻和军事行动合在一起解决。

12月25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在谈判中，蒋介石态度“非常诚恳”，称与周恩来是“患难朋友”。次日，周恩来在向中央报告这次会面时说，蒋介石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

周的估计与毛泽东想法是不谋而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说：国民党目前不过是大吹小打，在全国进行反共有困难。他在这天致电周恩来时，对新四军北撤问题指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以拖为宜，拖到（1941年）1月底再说。

中共中央对待新四军军部北移问题总的态度与精神，与项英犹

豫、观望的行动方针也是不谋而合，酿成这个大悲剧，项英和中共中央都负有严重的责任。

1941年1月9日凌晨，新四军军部九千余人已英勇奋战三天三夜，此时项英惊慌失措，竟不顾全军指战员安危，与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秘书长李一氓等突然“不辞而别”，带几个警卫员独自突围，使得叶挺军长及新四军军委会委员饶漱石等极为震惊，立即报告了中央，说他们“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向不明”。

敌人用五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新四军所处泾县一小块地区，尽管项英等人东奔西突，仍无法脱围，一天之后又转回到军部，与叶挺、饶漱石重新会面，并向中央做了沉痛检讨，听候处分，但此时新四军一切工作已归叶、饶全权指挥，项英已被撤职。

三天之后，七千余新四军指战员的热血洒向皖南的山岗，年仅43岁的项英在蜜蜂洞被叛徒枪杀。

（责任编辑 刘家驹）

## 本刊启事

为了方便读者，凡延误订阅或在当地邮局订阅不便者，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邮购，每期定价4.80元。补购或预订季度、半年、全年均可。

本刊先仅有1997年合订本（精装每套54元，简装每套49元）及少量1996年合订本（精装每套52元，简装每套49元）。创刊至1995年历年合订本早已告罄，欲补单刊者，请来函说明所缺期号，若有存书当即寄去。以上均免收邮寄费。

另，本刊自1994年—1997年每年出《学术增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一册，1至4期均有存书，每册加邮费9元。

本社地址：北京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政编码：100007

电话：6407.2452或6403.1144转2004